

学术支持:
清华大学新经济与新产业研究中心
中央财经大学中国改革和发展研究院
总顾问:成思危(原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
高级顾问:张文台(全国人大环资委第十一届副主任)
编委:管益忻 陈宇 黄文夫 赵红 白卫星
编委会主任:管益忻
副主任:陈宇
主编:管益忻
副主编:启文 白卫星

学术顾问:(按姓氏拼音排序)
巴曙松 蔡继明 陈东琪 陈栋生 陈佳贵
程恩富 迟福林 戴园晨 范恒山 樊 纲
高尚全 顾海兵 谷书堂 贺茂之 洪银兴
黄范章 贾 康 江春泽 金 碚 李成勋
李江帆 李京文 李维安 刘诗白 刘 伟
茅于軾 任玉岭 宋洪远 宋守信 宋养琰
谭崇台 王东京 卫兴华 魏 杰 吴 澄
徐长友 晏智杰 杨家庆 杨启先 张曙光
张晓山 张卓元 赵人伟 郑新立 朱铁臻
周叔莲 周天勇 邹东涛



林毅夫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

到了一次世界大战民族主义风起云涌,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发展中国家在其几代政治领袖和全国人民抛头颅、洒热血的不懈努力之下,终于纷纷摆脱殖民统治,迎来了民族解放,政治独立,开始追求自己国家的现代化。发展中国家无不希望早日摆脱贫穷落后的面貌,和发达国家并立于世界强国之林。

因基于发展中国家的需要,发展经济学从现代经济学中独立而出,成为一个现代经济学的分支领域。发展经济学家提出各种理论,做为国际发展机构指导新独立的落后国家发展经济和发展中国家政府制定发展政策的依据。但是,60 多年的时间过去了,发展中国家的发展绩效令人失望。 根据安格斯·麦迪森(Angus Maddison)整理的数

据,从二战后的百废待举中恢复起来的 1950 年到战后最为严重的国际金融危机爆发的 2008 年间,全世界只有我国台湾地区和韩国两个经济体实现了现代化的梦想,从低收入经济体跃升成为高收入经济体;只有 13 个经济体,从中等收入进入到高收入经济体,其中只有日本、韩国、我国台湾地区和香港地区、新加坡和以色列不是石油生产国或二战前就已和发达国家差距不大的欧洲国家;全世界也只有 28 个经济体实现了和美国人的人均收入缩小 10 个百分点或更多,其中只有 12 个不是石油、钻石生产国或欧洲国家;而且,还有阿根廷和委内瑞拉两个拉丁美洲国家从高收入滑落为中等收入国家。除了近 20 个在二次世界大战前就已经是发达的国家之外,全世界 200 多个国家绝大多数都陷在低收入或中等收入陷阱中。

2008 年 6 月,我到世界银行担任高级副行长兼首席经济学家。世界银行成立于 1945 年底,其宗旨为帮助世界各国发展经济,消除贫困。但是,如果把我国改革开放以后,按 1 天 1.25 美元的国际贫困标准计算,摆脱贫困的 6 亿多人排除在外,全世界的贫困人口不仅没有减少,反而增加了。在世界银行工作期间我有机会走访数十个非洲、亚洲、拉丁美洲发展中国家,和其政府领导人、学术界、企业家、工人、农民深入接触交流,了解到他们和我国的政府领导人、知识分子、企业家、工人、农民一样都有强烈的愿望,希望经由他们自己的努力改善他们个人和国家的命运,也做了各种艰苦卓绝的尝试。但是,事实是他们的经济发展缓慢,经济、社会、政治危机不断,人民生活水平的改善有限,和发达国家的差距越来越大。

世界银行在每个时期的政策甚受那个时期主流发展理论思潮的影响,其他发展中国家的政策也是一样。理论的目的是帮助人们认识世界,改造世界。如果理论不能帮助人们认识现象背后的原因,或是根据理论的认识所做的努力事与愿违,那么,就应该对理论进行反思,提出新的,能够帮助人们更好地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理论。实际上发展经济学自成为现代经济学的一个独立分支以来其理论进展也是按照上述的逻辑演进的。

发展经济学的第一波理论思潮,或是第一版的发展经济学称为结构主义。当时的发展经济学家认为发展中国家所以贫穷落后是因为发展中国家没有发达国家先进的现代化

探寻中国经济背后的逻辑

从今天的眼光来看,在十八世纪西方国家工业革命发生之前,世界是平的,最发达国家和最不发达国家以人均收入来衡量的发展水平差距顶多只有 4~5 倍。工业革命以后,世界出现了大分歧。西方国家科学技术日新月异,经济发展一日千里;亚非拉许多国家仍然沿着传统、落后的生产方式,经济发展日显落后,国家实力不振,遂成为西方工业化强权的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十九世纪以来追求国家的独立、民族的振兴成为发展中国家社会各界精英的共同梦想。

版社分别以中、英文把我的讲座以《经济发展与转型:思潮、战略和自生能力》为题出版了专集,并有五位诺奖获得者为此书的英文版写了推荐,破了剑桥大学出版社的纪录。同时,有鉴于中国的发展和改革所要解决的问题和其他发展中国家多有雷同,中国的经验可供其他发展中国家参考,而主流经济学界和其他发展中国家对中国的了解甚为有限并多误解,我也由剑桥大学出版社出版了《解读中国经》一书。此书也得到不少好评,三位诺奖获得者为此书写推荐,其中 2000 年诺奖获得者赫克曼写到:“这本书向很多传统的新古典经济理论的信条提出了挑战,并解释了在现实中照搬这些原理是如何对许多转型国家造成灾难性后果的。”

在上述两本著作的基础上并结合我在世界银行工作期间和世行内部的经济学家,以及和许多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经济学界的进一步讨论,我在世界银行到任一周年时正式打出了新结构经济学的旗号,以此为框架来反思主流的发展理论和政策并构建第三版的发展经济学。著名的耶鲁大学经济增长中心也邀请我以新结构经济学为题去做 2011 年度的库兹涅茨讲座。

为了进一步推动发展经济学界共同进行反思,我邀约了多位著名经济学家在主流发展经济学期刊上对新结构经济学进行了三场讨论和辩论,这些文章以及几篇相关论文,在我世行四年工作结束离任之前的 2012 年初结集,取名《新结构经济学:反思经济发展与政策

的理论框架》由世界银行出版社出版。有两位诺奖获得者为此书写推荐,2001 年诺奖获得者斯宾塞写到:“本书将成为全球学者和政策制定者的重要参考,在发展中国家是如此,在发达国家中也将得到越来越多的重视。”

为了让各界人士对新结构经济学有所了解,以产生更大的社会影响,我又写了《繁荣的求索:发展中经济如何起飞》一书,在去年 9 月由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出版。此书用通俗易懂的语言诠释了新结构经济学的主旨,并结合了我在世行的工作经验和我自己从小以来对发展问题的思索来增加可读性。三位诺奖获得者为此书写推荐,其中 2001 年诺奖获得者阿克洛夫夫写到:“不会再有别的经济学家能写出比这本更优秀、更重要的作品了。”这本书也获得了英国《金融时报》著名评论员马丁·沃尔夫及《彭博新闻社》书评家克莱夫·克鲁克的好评。前者认为这是“一本既雄心勃勃又优秀的书”,后者则认为这本书是他 2012 年读过的“最有价值的新书。”

我对新结构经济学的思考源于在国内多年的工作、学习以及和许多学者的切磋。去年 6 月世界银行任期结束回到国内来,我抱着野人献曝的心情,盼望和国内经济学界切磋自己的一些新的心得。在北京大学出版社鼎力支持,苏剑和张建华教授的帮助下,上述三本新书的中文版陆续出书。甚受鼓舞的是中国世界经济学会授予了“新结构经济学:反思发展问题的一个理论框架”一文代表该学会年度最高荣誉的 2012 年“浦山世界经济优秀论文奖”。

我特别感谢《经济学季刊》在这一期邀约多年来在经济学研究、教育上成果丰硕的黄又安、韦森、余永定、张军、张曙光等五位学友在百忙中撰文对新结构经济学的理论框架和不足之处进行评论。其中韦森学兄的宏文洋洋洒洒 2.7 万字,在酷暑又逢丁忧的心境下挥汗完成,爱我之深令我心折。这几位学友对新结构经济学的赞誉是对我的鼓励和期许。他们的质疑、批评有些是新结构经济学作为一个新框架有待充实完善之处,有些是已发表的论述不够充分、清晰,有些则是仍以旧的视角来看我所讨论的问题,有必要进一步交流、澄清。以下我就新古典经济学的实质,现代经济增长的本质,政府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新结构经济学的理论是否建立在善良政府的假设之上等四个方面的问题来和以上五位学友交流、切磋。

新古典经济学的实质

韦森认为新结构经济学的理论框架“是沿着经济学的古典传统和新古典经济学分析

理路的一个创新和发展”,因为“新结构经济学强调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核心作用”。韦森同时认为新古典经济学潜含“自由放任”(laissez-faireist)的精神传统,由于新结构经济学主张政府应该积极有为地发挥因势利导的作用,因此他认为新结构经济学扬弃了新古典经济学的传统。

韦森上述的评论显然是把新古典经济学以现有的发达国家的经济学家所发展出来的理论成果的存量作为新古典经济学的范畴来画地自限。由于自亚当·斯密以来,现代经济学的发展以西方发达国家的经济学家为主导,发展不是这些发达国家的主要社会经济问题。发达国家的经济学家在分析资源配置时通常以给定的产业、技术为前提,并且,假定不存在外部性和信息不确定性,因而,得出了竞争性市场是人类社会资源配置的最优机制,“自由放任”也就成了新古典经济学潜含的精神传统。诚如张军所言,“经济发展作为一个特定的对象并不在(由发达国家的经济学家所研究的)新古典经济学的概念范畴之内”,以现有的新古典理论体系来“思考和对待后进国家的经济发展现象,那就只能像华盛顿共识所蕴含的那样,市场化是唯一的解决方案,政府可以选择经济发展政策和战略的自由和机会极其有限。”

然而,理论的作用在于帮助人们认识世界、改造世界。作为来自发展中国家的认识学者,我们不能因为经济发展作为一个研究对象不在发达国家那些新古典经济学家的概念范畴之内,我们就只能削足适履地以新古典经济学现有的理论体系来“思考和对待后进国家的经济发展现象”。新古典经济学的现有理论是发达国家的经济学家以理性人的基本假设做为切入点来研究、分析发达国家的重要社会经济现象所取得的成果。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学家也可以以理性人的基本假设做为出发点来研究对发展中国家至关重要的发展问题。现代经济增长是一个十八世纪下半叶工业革命以后出现的技术、产业、硬的基础设施和软的基础设置(制度)等的结构不断变迁的过程。外部性、协调和信息不确定性是这个过程内生的问题,从福利经济学第一定理可以得出政府应该积极有为,帮助单个企业克服自发发展过程中必然出现的外部性和协调多个利益不尽相同的企业行为的市场失灵的问题,这样发展才能顺利进行。所以,新结构经济学对政府应该积极有为,发挥因势利导作用的强调是新古典经济学研究方法在发展问题上的运用的结果,是对新古典经济学研究传统的弘扬而非扬弃。(下转 04 版)

中国能够管控好经济放缓

迈克尔·佩蒂斯 北京大学金融学教授

简单的逻辑显示,中国若想一方面推动经济再平衡、减少对出口以及由债务助推的投资的过度依赖(这种过度依赖是危险的),另一方面保持当前的 GDP 增速,是近乎不可能的。想一想“再平衡”对中国意味着什么吧——目前家庭消费占 GDP 的 35%,这一比例之低令人震惊,它仅略高于全球平均值的一半。

若要策动一场再平衡、使消费的占比在未来 10 年提高至 50%(那仍将意味着中国是世界上消费占比最低的大型经济体),年度消费增幅就必须比 GDP 增幅高出近 4 个百分点。因此,6%或 7%的 GDP 年均增幅意味着,中国必须在 10 年期间达到近 10%至 11%的年均消费增幅,才能实现有意义的再平衡。

从以往经历看,中国即使在最繁荣的时期(当时中国乃至全世界的增长都比现在迅猛得多),也达不到这么高的消费增长。在中国乃至全球形势都低迷很多的当下,要让中国实现这么高的消费增长,是近乎不可能的。

消费占比偏低主要是政策的产物,这些政策系统地将从资源从家庭部门转移到别处,以补贴快速增长。这种做法压低了家庭收入在 GDP 中所占的比重;中国的这个比重在 50%上下,在世界上属于有史以来最低的。不提高家庭收入,就不存在提高家庭消费的可持续方式。

这似乎表明,要实现 10%至 11%的消费增长,家庭收入也要有相似的增长。原则上,中国可通过大幅提高劳动者工资和大幅上调银行存款利率来做到这一点。但由于低工

即便在北京方面宣布最新的“微刺激”之际,人们也应当搞清楚一点:中国经济增长距离触底还很远。未来几年里,全球第二大经济体的增速将放缓至远低于目前所预期的 6%至 7%的水平。尽管多数分析师相信国内生产总值(GDP)增长放缓肯定会引发社会不安定,但他们也许正在关注错误的数字。

资和廉价资本是中国增长模式的核心内容,通过大幅提高工资和存款利率来实现经济再平衡,将导致增长崩溃;只有让债务持续飙升,才能使家庭收入增长得足够快,进而一方面保持较高的 GDP 增长,另一方面实现经济再平衡。当然,这种做法最终是会引发自我毁灭的。

这就是为什么 GDP 增幅必须进一步下降。但在连续多年实现高于 10%的 GDP 年度增幅之后,若 GDP 增幅跌破 6%至 7%的水平,似乎会与中国老百姓日益高涨的期待发生冲突。较慢的增长会引发社会不安定甚至政治风波吗?不一定。

要让中国经济成功实现再平衡、在保持社会安定的情况下转向更健康、更可持续的增长模式,真正重要的增长率——正如多名中国知名经济学家已经指出的——是家庭收入中值的增长率。与任何地方的人们一样,中国老百姓并不关心自己的那一份 GDP,他们关心的是自己的收入。



最近几十年来,实际可支配收入的年均增长率远高于 7%。要确保社会稳定,实际可支配收入应当继续以这个增速或接近该水平的增速增长。但是,家庭收入和家庭消费增长达到 6%至 7%意味着,如果中国要实现有意义的再平衡,GDP 就必须“仅仅”增长 3%至 4%。这个低得多的 GDP 增幅至少意味着投资增长要近乎为零。

换句话说,中国的 GDP 不需要每年增长 7%或者 6%才能保持社会稳定。那是一个应当摒弃的神话。就社会稳定而言,重要的是中国老百姓继续以他们习以为常的速度提高生活水平,同时中国调整其经济结构的方式能够使其控制信贷泡沫。

如果家庭收入能够每年增长 6%至 7%,10 至 12 年后收入将翻倍,这与中国总理李克强今年 3 月在全国人大会议上提出的目标相符。此外,如果中国在做到这一点的同时能使经济摆脱对信贷的依赖,那将是一项不寻常的成就——尽管这难免意味着,GDP 要以远低于我们所习惯的增速增长。

这并非易事。降低投资和 GDP 增长,几乎肯定将给就业和家庭收入增长带来压力,除非通过从国有部门向家庭部门的显著资源转移来加以抵消。这种做法将遭到从强大的国有部门获益匪浅的政治精英的强烈反对,但我看不出中国还有多少别的选择。的确,不这么做的话,再平衡这道算术题是谁也解不开的。